列宁曾做出过如下判断：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暂不提其论断是否正确以及在这个解释下苏联后续的历史将会变得多么荒谬，仿照其句式，我们大概可以说，斯大林模式是专制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或许只是到目前为止，毕竟，在自我戕害方面人类一直独占鳌头）。

“最高阶段”的体现，大概是有历史记录以来，还未曾有哪一种制度像斯大林模式（及基于此的各色衍生特色版本）将专制的权力渗透进生活中的近乎方方面面，从精神上剥夺私人空间的合法性，攻破连纳粹也未曾染指的家庭领域。

布尔什维克对马克思思想的违背，或许比基督徒对耶稣教诲的违背还要来得荒唐，连苏维埃政权的诞生都是建立在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曲解之上。等级制度并未消失，不过更改了姓名，不同等级之间不只是生活水准的高低区别，更是生与死的区别。被视为苏维埃社会中底层的人，连思想都是一种罪过，更不要提什么全人类的解放了。

斯大林模式是现代的产物，只有在现代武器的装备之下，才有可能对内部进行如此大规模的逮捕、镇压、处决、流放而不至于发生足以撼动政权的大规模反抗。而权力对思想登峰造极的控制也是建立在对暴力机器的垄断之上的。甚至相较于对肉体的残害，精神上的压迫倒显得可以忍受，自然有许多受害者反倒成为了斯大林体制最极端的拥护者。

极端的专制权力本是一种异常现象，对此的维持则要依靠同样异常的环境条件，大多数情况之下，是存在或虚构极端危险的敌人。对于纳粹而言，敌人是犹太人、抢夺雅利安人生存空间的外国人，对于苏维埃而言，任何国民明天都有可能是敌人。一种滑稽的可能性是，如果德国不发动对苏联的进攻，或许苏联社会将会亡于无止尽的自我毁灭。讽刺的是，战争时期社会氛围倒比平时更令普通人易于接受，思想也更为活跃，爱国的热情胜过了恐惧。而当战争结束，似乎又变回了老样子。专制的恐怖实际上任何人都无法避免，就连最高权力的所有者亦死于对医生的猜忌。

从现有的经验来看，极权社会从来不是一个足够好的解决方案，它只会带来比所得更大的代价，只是承受代价者已不是当初享受好处的那群人。极权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更难预测，所发生的事情也更为随意，因为领袖既然拥有无限的权力，那么便不受条条框框的束缚，将个人的特性以最糟糕的方式发挥到极致。

历史该归咎于谁呢？斯大林、列宁，他们当然应该承担为首的责任，但不妨以“人民史观”来说，这是集体的共谋。最该担起责任的是我们，为了不使相同悲剧一而再地重演。“历史总会重复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总是荒诞的笑剧。”但悲剧的重复，仍旧是悲剧。